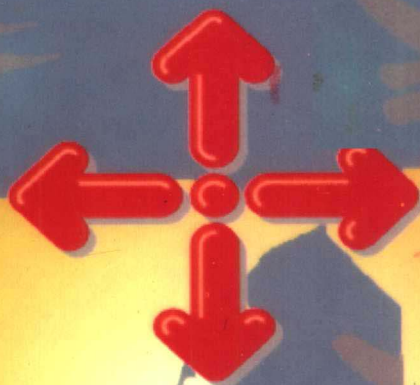


如何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筹资

左柏云 主编



广东经济出版社

如何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筹资

左柏云 主编

广东经济出版社

责任编辑：钟晓明

封面设计：新 思

责任技编：陆俊帆

如何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筹资

左柏云 主编

出版 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5楼）
经销	广东省新华书店
印刷	广东科普印刷厂（广州市广花四路棠新西街69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64,000字
版次	1998年9月第1版
印次	1998年9月第1次
印数	1~5,000册
书号	ISBN 7-80632-328-7 / F·156
定价	1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读者热线：[发行部] (020) 83794694 83790316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思索

(代前言)

1997年台风肆虐的夏秋之交，一场比顶尖级台风危害更大、范围更广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在泰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爆发了。随后，迅速波及东盟各国金融系统，北卷韩、日，西拂台湾、香港，东掠拉美，南震澳大利亚。刹那间，整个太平洋周边国家风声鹤唳，个个自危，全球股市、汇市也弄得波涌云诡、险象丛生。

东南亚金融危机与1994年底至1995年春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的表象特征十分相似。一是进口增长过快，出口上升缓慢，经常项目逆差扩大；二是汇率贬值，资金外流，外汇储备锐减；三是金融机构经营困难，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四是利率上升，物价上涨、工人失业、经济下滑。但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远非墨西哥金融危机所可比拟。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前后两次震荡全球的金融危机居然都在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的部分“龙”“虎”国发生，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目前，国内外学者都在探索这两场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从表面看，这些国家发生金融风波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1. 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入，国际投机资本肆意破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伴随着科技和信息革命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进入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上。其突出表现：一是国际资本规模越来越大。跨国资本从1990年的4400亿美元增至1996年的15700亿

美元。1996年西方主要国家的跨国股票和债券累计额占其GDP的比重超过了100%，美国就高达10万亿美元。二是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加快。最典型的是跨国外汇交易急剧增加。1986—1995年，扣除重复计算，国际外汇交易的日交易额从1880亿美元猛增至12000亿美元，它占世界全部外汇储备的比重从37%增加到84%。三是金融市场波动更为剧烈。集中表现于利率波动和汇率变动大。1993—1996年，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变动幅度高达3%。1991—1997年3月，日元汇率变动幅度高达70%，美元、马克、加拿大元的汇率变动幅度也达20%~30%。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发展中国家在加速融入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表现之一是90年代以来，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私人资本猛增，而且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快、开放程度高的东亚和拉美国家。1991—1996年，发展中国家每年引进的外资净额从1000亿美元增至3000亿美元，其中私人资本从440亿美元增至2400亿美元，东亚从190亿美元增至1100亿美元，占流入发展中国家总数的40%。墨西哥和泰国在危机爆发之前，外资流入的规模都是很大的。墨西哥1994年底外债余额854亿美元，占GDP的50%多，另有国际直接投资近200亿美元；泰国1996年9月外债余额771亿美元，占GDP的45%，另有国际直接投资200亿美元。外资大规模流入东亚和拉美发展中国家，不仅给这些国家解决了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而且带来了技术和市场，促成了这些国家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国际化程度不同。发达国家金融一体化程度高，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实际利率差逐步缩小。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较低，与发达国家的利率差较大，为赚取利差和汇差，国际短期资本频繁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流出和流入。这就给利用利率差和汇率差赚取收益的国际金融投机商以机会。事实上，在国际资本流动中，也不乏专门的国际金融炒家。据海外舆论报道，

1997年5月泰国汇率开始贬值后,美国金融投机商索罗斯就在泰国外汇市场投放了60亿美元,进行外汇炒作,把泰铢逼上绝路。1992年欧洲汇率体系不稳时,此人利用英镑汇率的变动在外汇市场上买进卖出,赚取了20亿美元,并迫使英镑退出欧洲汇率体系。但我们在讨论这方面的原因时有两个问题需要弄清楚。第一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放松对外资流动的控制,大量引进外资是否对头?第二个问题是,国际金融投机商利用的机会来自哪里?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今天,国际资本流动已经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的杠杆。在当代,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引进外资作为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东亚和拉美国家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跻身新兴工业化国家前列,在相当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些国家能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以积极态度对待外资,并有效利用了国际资本带来的好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很清楚,国际金融投机商利用的机会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而是他们发现的。显然,如果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比较稳定,他们就没有投机的机会。换句话说,是他们看准了一国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才利用金融市场的动荡机会来发财的。例如,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之前,最先感觉到危机威胁从而转移资本的是本国居民。当时,墨国居民得知出口增长下降,国际收支逆差增大,外汇储备减少,本国货币将贬值,从而大量购入美元,加速外汇储备减少,引起汇率波动,然后,外资才开始抽逃。可见,发生金融危机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系统出了问题,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国际金融投机商只起了一种外部推动作用。

2. 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改革过快。

应当肯定,80年代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东亚和拉美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如放松银行业务限制，取消外汇管制，开放证券市场，鼓励本国金融机构对外扩张，等等，加快了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步伐。但是，把其中一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对外开放金融市场是不准确的。当然，如果这些国家继续实行金融抑制政策，金融市场不开放，国际资本不能自由流出或流入，投机商也无计可施，危机自然不会发生。但国际资本不是随意流动的，其流动的目的是赚取更大的收益和分散风险，决定国际资本投资者手中的钱流向的基本要素取决于受资国的金融开放程度和经济前景。如果一个国家实行金融开放后，经济高速度增长，资本收益率也高，外资流入增加是自然现象。但是，外资大量进出和金融投机商得手不能归罪于经济金融的开放，而应从受资国的内部因素寻找原因。墨西哥、泰国等实行金融市场自由化、国际化，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但并不构成这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必然，而它们的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和结构与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特别是与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要求的下述种种脱节之处，才是金融危机生成的深层原因。

(1) 经济政策不适应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在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幅度增大的条件下，墨西哥和东南亚国家仍对汇率和利率变化实行限制，对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反映滞后。例如，墨西哥 90 年代初实行比索对美元的固定汇率，而 90 年代前四年累计下来的通货膨胀达 53%，外贸逆差 870 亿美元，在汇率没有反映这种情况的条件下，比索贬值是必然的。但是当时的墨西哥政府面对比索高估迟迟不采取适时贬值的措施，以致出口受阻，外贸逆差逐年扩大，1991、1992、1993、1994 年分别为 110 亿、250 亿、230 亿、280 亿美元，给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同时，当时的墨西哥政府为了治理通胀，提高国内储蓄率，吸收外资以支持进口商品的外汇需求，实行了高利率政策。1990—1992 年墨西哥实际利率高达 20%~25%，1993 年略有下降，但仍达 14% 左右，大大高

于国际市场利率，而国内企业贷款的实际利率比这还高。这种高利率政策既使墨西哥企业无法承受高利息成本而无力归还银行贷款，造成银行坏账问题严重，又使墨西哥对外支付高额利息，造成国际收支恶化，货币贬值压力加大。又如泰国，长期实行泰铢与美元联系汇率制，14年来，一直保持在25铢左右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当美元贬值时，它对西方主要货币的汇率也随之贬值，增强了出口竞争力。当美元升值时，泰铢随之升值，出口竞争力下降。1996年以后，美元对日元持续升值，泰铢对日元也不断升值，成为进口增长过快和出口增长率降低，以及国际收支恶化的重要原因。

(2) 经济体制不适应对外开放。一国经济开放之后，外资流入增加，本应加强金融体制建设。但是，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对金融市场开放的准备不充分，国内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不足，监管措施和机构不完备，盲目向外资开放。例如，在本国银行体系风险过大的情况下，泰国主动向外商提供低息美元贷款，为房地产投资热火上浇油。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必然导致本币和外币的频繁交易，采用中央银行控制汇率的方法与巨额外汇交易相矛盾，当资本外流增大时，对外汇的需求增加，本币贬值受到压力。为了捍卫联系汇率，泰国在一个月之内就动用了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仍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给国际金融投机商炒作外汇以可乘之机。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中央银行曾经一天之内抛售60亿美元，企图把比索兑美元的比价稳定在政府设置的指标范围内，结果仍抑制不住比索跌势，外汇储备锐减到无法保持经济正常运转的60亿美元，次日不得不宣布中央银行不再干预外汇市场。这些事实说明，政府行为与市场对抗，难以成功。只有适应市场规律，实行浮动汇率才是出路。

(3) 金融体系不适应金融市场的发展，长期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经济过热导致“泡沫经济”，形成脱离实体经济的虚假繁荣，

只是金融动荡的表层原因。长期资本市场建设滞后造成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才是深层次原因。具体包括：一是资本结构不合理，投资者较少用中长期债券筹资，而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而且往往是短期资金，不适应长期投资项目的需要。二是信贷投向结构不合理。银行倾向于提供非生产性用途的贷款。例如，泰国的银行贷款有 1/4 是消费性贷款，1/4 是房地产贷款，这类贷款难以产生收益，银行坏账增加。据世界银行断定，1996 年泰国放款机构的不良贷款占其贷款规模的 10%，达 155 亿美元，1997 年银行的坏账相当于泰国 GDP 的 9%。三是外资结构不合理。由于中长期资本市场不发达，外资多以短期资本形式流入。1994 年进入墨西哥的 700 多亿美元外资中，3/4 属于短期证券资本，美国互助基金一类的短期投资比重很大，其中进入股市的有 330 多亿美元。1995 年流入泰国的 6 466 亿泰铢外资中，直接投资仅占 5.5%，商业银行贷款占 51.1%，且大部分是短期贷款，投机性和流动性最大的非居民泰铢存款和证券投资占 30.7%。由于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当宏观经济不稳定时，外资抽逃，引发股价下跌，金融机构瘫痪，本币贬值，是不足为怪的。

(4) 产业结构调整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是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的产业结构调整片面迎合外资投向，不但彼此之间及其与后起的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趋同，而且过分集中于技术含量不高的一般加工工业。二是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能力较低，国内科技水平不高，对进口技术和设备的依赖过大。三是劳动成本上升过快，不利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国际竞争能力被削弱，出口增长速度下降，造成国际收支巨额逆差，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例如，墨西哥和泰国的出口产业面对来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低成本同类产品的竞争，未能升级换代，以致竞争力减弱，出口增长缓慢，国际收支逆差扩大，两国在危机爆发之前，外贸逆差占 GDP 的比例分别接近和超过了 8%，大大高于国

际公认的安全线 5%，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推动因素。

(5) 贻误时机，调整不及时。当出现金融动荡之后，政府出于种种原因，对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和结构不及时调整，以致贻误时机，激化矛盾。墨西哥和泰国的情况都是这样。1968—1988 年墨西哥先后有 4 届总统因经济危机而下台。1994 年西方经济复苏，利率随之上扬，加上当时墨西哥政局不稳，一些外国投资者便开始抽走资金，货币危机苗头已经出现。此时，本应果断采取调整措施，但当时的萨利纳斯总统为了赢得年底的总统选举连任，不但不及时调整货币政策，改革汇制，反而动用了上百亿美元的国际储备弥补亏空，极力制造繁荣假象。结果等到当年 12 月 1 日新总统塞迪略就职时，国库剩下的国际储备已经不多，12 月 19 日晚遂决定通过比索一次性贬值 15%，来促进出口，减少进口，阻止资金外流，稳定外汇市场，结果引起始料不及的比索汇价暴跌，最终酿成了严重的金融危机。1997 年 2 月，泰国金融形势开始恶化，政府未采取拯救措施。5 月，泰铢贬值到 14 年的最低点，政府仍坚持对汇率的控制。对应该倒闭的金融机构，政府仍实行注资的做法，白白花费了大量资金。7 月，被迫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之后，泰铢继续贬值，外汇储备持续下降，但政府仍背着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和“虎”国的美誉包袱，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计划犹豫不决，以致矛盾越积越多，一发难以收拾。

此外，墨西哥、泰国等政局不稳，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深，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促成因素。

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的教训说明，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市场动荡，不是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必然结果，而是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和结构如何适应国际经济大环境变化，特别是如何适应国际金融一体化进程，趋利避害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这些危机国家的医疗方案，没有一个国家是采取放慢市场化、国际化改革步

伐，控制外资流动的措施，相反，全部都是采取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调整金融市场结构，加强金融监管，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外资引进等举措。墨西哥实施这样的医疗路线，经济形势迅速好转，外移资本很快回流，1995年秋出口上升，外资流出减少，1995年底重新发行国际债券76亿美元，全年吸收国际直接投资70亿美元，1996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75亿美元，国际证券投资300亿美元，1997年7月底国际证券投资增加到497亿美元。据1997年5月世界银行研究报告资料，在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中中国得到52%，居第一位，墨西哥得到28%，居第二位。由于外资大量回流，墨国经济发展出现良好势头，1995年GDP增长1%，1996年增长3.5%，1997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下增长势头未减，估计为4%左右。1996年3月，墨西哥提前偿还了危机期间向美国财政部所借的70亿美元，1997年第一季度其外汇储备比1996年底增加25亿美元，达到200亿美元。可以肯定，东南亚国家在实施这样的医疗路线之后，亦会迅速扭转经济下挫的局面，该地区不久将会再次成为经济快速增长和吸引外资的热点。

利用外资是我国改革开放路线的重要内容，19年来，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令世界瞩目。据资料统计，截至1997年底，我国引进外资累计360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2200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32万家，已经营运的大多数项目情况良好，特别是大中型项目成功率超过80%。1997年，中国利用外资保持了增长态势，全年实际利用外资519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453亿美元，比1996年增长7%，新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21046个。随着利用外资规模的迅速扩大，外资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具体表现在：

1. 外资成为我国资金筹措的重要来源和投资增长的促进因素。

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由 1985 年的 5.4%，上升到 1996 年的 20.5%，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的这一比重由 2.1% 上升到 15%，超过了除新加坡以外的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 90 年代初的这一比重，1996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比 1991 年增长 4.3 倍，而利用外资额增长 5.1 倍，其中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 9.7 倍。

2. 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据统计，截至 1994 年底，我国已签订技术引进合同 5 600 多项，合同金额 400 多亿美元，引进规模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完成的技术引进合同和金额数分别为 1979 年以前 30 年总和的 6.6 倍和 3.5 倍。借用外资引进技术、进口成套设备，为我国工业新添了大批关键项目，壮大了我国工业的综合实力。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一大批先进实用的技术，填补了我国许多产品技术空白，为我国的汽车、电梯、家用电器、计算机、通信器材，食品、数控机床，仪器仪表等工业上规模、上质量、上档次作出了贡献。利用外资不仅带来资金和技术，也带来先进的管理知识，目前，国有企业管理模式改革的思路 and 做法，不少来自于外商投资企业。

3. 推动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创造就业机会。

我国利用的外资绝大部分投入交通、通信、能源等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部门和老企业的技术改造，扩大了这些产品的生产能力，增强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

外商投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特别是我国工业增长的重要源泉。1990—1995 年，我国工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从 2 392 亿元增加到 91 894 亿元，增长 2.8 倍，而同期外商投资企业产值从 498 亿元增加到 10 714 亿元，增长 20.5 倍。外商投资企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由 1990 年 2.1% 上升到 1996 年 12.02%。

随着外商投资企业的增加，非关税的涉外税收逐年增大，

1991年全国涉外税收仅69亿元、1994年390亿元,1997年1~10月达到778亿元,同期涉外税收占国内税收总额比重从2.3%上升到6.5%和10%以上。

利用外资给我国提供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截至1996年底,已开业的外商投资企业的从业人员已达1700多万人,约占当年工资性就业总人数的5%。如果再加上为外商投资企业配套或提供服务的企业项目,则新创造的工作岗位数更多。

4. 促进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外商投资企业和国际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外商通过直接投资将各种经济联系,如供销渠道、技术开发、市场和信贷关系等带进我国,带动了外商投资企业及其国内配套企业产品出口,进入国际市场。凭借这些有利条件,及其较强的产品竞争能力,对我国经济同国际经济接轨起了重要作用。据统计,1995年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39.1%,其中出口份额占31.5%,进口份额占47.6%。

5. 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外资的大量流入,直接促进了我国传统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对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格局起了积极作用。外资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补充,它的进入推动了国内企业产权的流动和重组,国有、集体和外资等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逐步增加,形成了新型的财产所有结构。外商投资企业采用国际上通行的企业组织形式,客观上促进了我国国有企业制度的改革。

外商投资带进了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外商投资企业完全按市场机制经营、企业生产所需要的各种投入品和劳动力均需从市场上获得,产品销售也要通过市场来实现,以市场为导向的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其本身的经营活动,一方面引入国际竞争,包括产品和服务在价格、质量、技术水平等方面的竞争;另一方面也促

进了国内金融、生产资料、劳动力、技术、房地产和信息等要素市场的发育。

外资的大量流入还推动了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外资的进入使我国的经济生活变得复杂多了，大量资金、货物的流入流出，市场配置资源所产生的种种新情况、新问题，都要求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运用利率、汇率、税收等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调控经济，而不能滥用行政手段搞直接控制，从而促进了政府职能和作风的转变。

尽管我国在利用外资工作中，存在有外资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技术结构、规模结构等不尽合理的地方以及抢占中国市场、挤压民族工业等方面的问题，但这都是属于如何进一步提高引进外资水平以便更充分地获得国际资本带来的好处的问题，而不可当作限制引进外资的理由。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国内有人提出，为了防止重蹈东南亚覆辙，中国应该放慢对外开放和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步伐，缩小利用外资的规模。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显然是不可取的。1997年11月11日李岚清副总理在“中国投资政策与投资风险保险国际研讨会”发表讲话时十分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努力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更加充分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建立现代化的开放型经济……中国将坚持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方针，引导并优化利用外资的结构，有步骤地推进服务业的开放，中国将继续扩大吸引外资的规模，包括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外贷款。中国政府鼓励外资投向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和外向型产业，投向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并将采取国际通行的多种利用外资方式，包括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等新投资方式的试点。中国政府将在不断完善引进外资产业政策的基础上，有步骤地推进金融、保险、贸

易、通信等服务领域的开放,完善有关法律体系和政策体系,改进和完善投资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逐步实行国民待遇。中国将继续根据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和偿还能力,借用国外贷款。中国将把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和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利用外资的水平提高到新的高度。”^①这一讲话精神表明,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不动摇,扩大引进外资规模和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仍然是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肯定,随着我国产权制度的变革和资产重组的广泛展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国际化步子会加快,会有越来越多的部门和企业走向国际金融市场开展筹资活动;不仅多年来已经比较熟悉的国际借款、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等筹资方式会继续使用,而且原来处于试验和摸索阶段的企业海外上市、国际债券发行,租赁融资,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等筹资方式也将广泛使用。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学习国际资金筹措理论与方法的活动。正是为了满足这一要求,我们编写了这本书。

参加本书初稿写作的有左柏云(前言、第二、四章)、朱剑彪(第一、三、五、六、八章)、何剑(第七、九章和第十一章的案例1、2)、黄正新(第十章第一、二节)、余柚子(第十章第三、四节和第十一章的案例3~8)。全书由左柏云提出写作提纲,并负责统稿和定稿。在本书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广东经济出版社钟晓明、赵世平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左柏云

1998年2月25日于广东商学院

^① 见《人民日报》1997年11月12日。

目 录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思索 (代前言)	(1)
第一章 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新特点	(1)
第一节 国际金融市场架构	(1)
第二节 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新特点	(10)
第三节 国际筹资环境变化与筹资策略	(17)
第二章 国际金融市场的资金供求状况	(24)
第一节 国际金融市场的资金供给状况	(24)
第二节 国际金融市场的资金需求状况	(31)
第三节 国际金融市场资金需求大于供给条件下的筹资 投资竞争	(39)
第三章 国际筹资的程序、成本和风险	(53)
第一节 国际筹资的基本程序	(53)
第二节 国际筹资成本分析	(58)
第三节 国际筹资风险及防范分析	(65)
第四章 国际短期资金的筹措	(74)
第一节 国际短期资金及其流动机理	(74)
第二节 国际贸易中的短期资金融通	(85)
第三节 国际短期资金的筹措策略	(96)

第五章 利用国际中长期信贷	(101)
第一节 争取外国政府贷款	(101)
第二节 争取国际金融机构贷款	(109)
第三节 利用辛迪加贷款	(118)
第四节 利用出口信贷	(129)
第六章 发行国际债券	(136)
第一节 国际债券市场概述	(136)
第二节 国际债券的发行	(147)
第三节 国际债券融资策略	(157)
第七章 发行国际股票	(164)
第一节 国际股票筹资的发展及其原因	(164)
第二节 国际股票筹资的方式	(168)
第三节 我国发行国际股票筹资的实践	(168)
第八章 国际租赁融资	(180)
第一节 国际租赁概述	(188)
第二节 国际租赁合同	(194)
第三节 国际租赁的组织安排	(199)
第九章 如何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筹资	(204)
第一节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其筹资方式	(204)
第二节 项目融资	(210)
第三节 BOT 方式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221)
第四节 ABS 方式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前景	(228)